

《戰後臺灣漢傳佛教史》導論

江燦騰

——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的開展歷程(上)

一、

本書是一本由中華民國教育部補助建國一百年讓學術詮釋歷史專題計畫(A類：宗教學門)的合著論文集(台北：五南，二〇一一)。由江燦騰負責主編，但實際執筆的作者，共有三人，即：江燦騰、侯坤宏和楊書濠。所以，本書各篇都有其原作者的署名，讀者一看即知，此處不再多作說明。

在附錄中，除筆者所撰的一篇之外，還有關於一九八七年台灣正式政治解嚴後，才相繼崛起的幾個台灣本土重要佛教組織之說明：執筆者是由釋性廣院長、釋法玄尼師和林蓉芝秘書長三人分別負責的；而彼等都是當代台灣佛教組織中，具有極大代表性的組織成員和相關圖文資料的提供者。

至於本書的全部撰述，在將近五十五萬字的相關圖文內容中，主要就是針對二戰後在台灣本土佛教文化與社會關懷的發展及其實踐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開展

或在地轉型的相關歷程，提出最新綜合性研究成果的專業報告，並進行新研究視野的詮釋建構和針對台灣當代佛教本土主體性確立的佛教史學新論述，乃至對其所具有的現代區域性佛教社會文化史的多元創新及其相關思想特色所展開的深度現代書寫。

因而，本書所採取的詮釋史觀，就是以戰後台灣本土「中華漢傳佛教」（以下簡稱「漢傳佛教」）為探討的主要對象，盡全力說明它在一九四九年的「雙源匯流」之下，逐漸朝向「在地轉型」與「多元創新」的高度發展。但為何要用上述的所謂「中華漢傳佛教」一詞呢：

這其實是針對過去學界常用「中國漢傳佛教」一詞的當代新界定，所以是具有超主權爭論作用的中性學術用語，也是本書作者們基於當代兩岸政治局勢發展現實的相應真實治學理念之表現。而本書中所要從事新詮釋建構的「在地轉型史觀」之思維邏輯出發點，和貫穿全書的相關論述主軸線，就是由此新界定的中性學術用語

來導引的。

此外，上述的另一個「雙源匯流」的新詮釋觀念，則是參考楊儒賓教授的原始說明，再精煉之後所提出的。其要點可摘錄如下：

一、在臺灣紀念中華民國百年，有極特殊的歷史背景。在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以前，臺灣在法理上不稱中華民國，它與中華民國是平行的發展線。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以後，臺灣屬於中華民國，但做為原來中華民國地理主體的中國大陸卻另立政權，從國際的政治觀點看，「中國」這個概念分裂了，「中華民國」與國際政治認定的「中國」也是平行發展的兩條線，「中華民國」的實質內涵反而與「臺灣」高度重疊。百年的「中華民國」具有複雜曲折的內涵，其領土、人民、國際承認各方面都歷經急遽的變遷。這種複雜的結構是中國境內其他地區罕見的，這也是「中華民國——臺灣」最特殊的構造。「中華民國——臺灣」的複雜內涵在百年人文學術的傳承上，反應得更加凸顯，臺灣的學術異於其他華人地區者，在於此島嶼的學術源頭不是單元的，它明顯的具有中、日兩國的源頭。

二、做為滿清帝國最早進入現代化的一個省，這個島嶼的成員基本上是由漢人與少數原住民組成的，其原始的學術表現不可能不奠立在以漢文化為主軸的基盤

上展開；但身為最早被編入日本帝國的這塊殖民地，其殖民母國乃是近現代歐美地區外最早也是最成功仿效現代學術體制的國家，所以臺灣的現代性學術機制也不可能不受到日本強烈的塑構。一八九五年臺灣被併入日本後，臺灣被迫參加了日本的現代化行程，這種殖民地現代化的規模極大，其變遷是結構性的，學術的現代化是其中極重要的一環。論及人文學科的現代化，一九二八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是個指標性的事件，在此之前，帝國日本在語言調查、人種調查、風俗習慣調查方面雖已投進不少人力物力，但直到爭議中的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後，整個現代學術的機制才有明顯的座標作用。

三、到了一九四九年，隨著史無前例的大移民蜂擁而至，也隨著史無前例的大量文化學術機構渡海而來，學術生態不變，臺灣學界不可能不重新接上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大陸的學術傳承。

四、而中國大陸的人文學術研究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交建構現代的學術機制時，通常也會參考日本的經驗，至少在草創時期，我們明顯的看到現代日本學制的影響。中國在十九世紀末後有股「以日本為師」的風潮，它給現代中國人文學術的傳承烙下極深的印痕。然而，現代日本在打造現代性的國家、國民、學術時，它所憑藉的思想資源往來來自於傳來的中國文化，比如朱

子學提供的概念系統，即以曲折的方式進入了現代學術術語之林。臺灣處在中、日兩大政治勢力交鋒的前緣，它的歷史命運很明顯的深深烙上中、日兩國文化的影響，但臺灣人文學界的兩個源頭卻遠比字面所示的要複雜。

五、雙源頭的概念之複雜遠不僅在源頭處的「中」、「日」兩詞語的文化內涵互文指涉，更在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華民國—臺灣」的人文學術發展迥異於以往的階段。¹

二、

根據以上的說明，我們應可以了解，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臺灣本土「漢傳佛教」的新發展，的確是在特殊的「雙源匯流」之下，朝向「在地轉型」的多元創新模式來開展的。

可是，「雙源」之一的現代大陸佛教，在其於一九四九年大舉遷臺之前，就目前學界所知，其實是處於二戰後國共多年內戰下，除少數的例外，大多是在各地動亂不斷的驚慌中四處流離，或必須在相當艱難悲慘的時局中惶恐地度過。

而其現代性的開展歷程，其實又可以溯源到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的爆發之年。因為辛亥革命爆發的結

果，是直接促成中華帝國的傳統專制體制的終結，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現代政治體制肇建的重要歷史分水嶺。宗教自由信仰行為，此後成為私領域的相關規範方式。

可是，在另一方面，眾所皆知，就臺灣本土佛教發展的近代重大變革來說，毫無疑問地，必須溯源到清末（一九八五年）的「割臺事件」這一重大的歷史轉折點。

此因早在一八九五年時，由於日清兩國的交戰雙方，在「甲午（一八九四年）戰爭」後，即簽有敗戰國的清方，須向戰勝國的日方，履行雙方已議定必須實際「賠款割地」，才能結束戰爭的〈馬關條約〉。從此，有將近半世紀之久，整個臺澎地區便成了大日本帝國海外殖民地的臺灣總督府轄區，並接受來自日本官方依《明治憲法》所衍生的特殊現代性宗教行政法之相關規範。²此一日本殖民官方統治模式，歷經半世紀之久（一八九五——一九四五），直到一九四五年時，因日本殖民統當局戰敗投降，並全面撤離臺澎地區，才告終止。³

所以，臺灣本土原有的「漢傳佛教」發展歷程，相對於在一九一二年才正式建立的「中華民國」（於大陸地區）的「漢傳佛教」發展歷程，後者其實是長期處

在國家的統治權多變和國家宗教法規極度不完備的狀況下，⁴ 因此從一九二——一九四五年之間，其所遭逢的坎坷艱辛歷程和處處離亂不斷的倉皇經驗，⁵ 自然是和前者發展歷程，大不相同。

因而，雖然在一九四九年時，上述這兩者，於戰後臺灣本土長期發展的歷程中，已曾一度出現所謂「雙源流」和「雙繼承」的特殊「雙源匯流」現象，但就本書的論述主體來說，雖不能有所忽略這一特殊重要的「雙源匯流」現象；不過，一旦將其在現實的考量上來抉擇兩者的孰輕？與孰重？則筆者個人依舊認為，本書更重要的詮釋對象，其實是要放在：自一九四九年起，海峽兩岸開始分治後的，臺灣本土新「漢傳佛教」發展歷程的相關說明上。

換句話說，如今，在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爆發後，即將屆滿百年的當代，我們若要回顧「漢傳佛教」這段宛若歷經驚濤駭浪後的輝煌社會成就，就我們做為當代臺灣佛教史學者的立場來說，當然想優先以全新構思的「在地轉型史觀」，就戰後臺灣本土「漢傳佛教」所發展和呈現出來的，各種出色的社會表現為例，來論述其中主要是自一九四九年出現特殊的「雙源匯流」之後，臺灣本土社會中和「現代性多元發展」與「本土化轉型創新」此兩者相關的歷史開展，及其相互交涉的複雜辯證過程。

註：

1. 轉引楊儒賓，二〇一〇年國科會「百年人文傳承大展計畫」的〈摘要〉說明。此外，文中各項的編號，是原文所無，由本文作者自行添加，以助讀者了解。
2. 參考江燦騰，〈日本帝國在臺殖民統治初期的宗教政策與法制化的確立〉，《中華佛學學報》第十四期（二〇〇一年九月），頁九一——一三四。至於清代傳統臺灣的佛教管理，可參考楊健，《清王朝佛教事務管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五九——一二一。
3. 見江燦騰，〈日據時期「日華親善」架構下的中日臺三角國際新佛教思想交流〉，《思與言》第三十八卷第二期（二〇〇〇年六月），頁四一——一四一。
4. 對此問題的出色研究，可參考黃慶生，《臺灣宗教立法》（太平：慈光寺，二〇〇五），頁一七七——二五四。
5. 黃運喜，《中國近代法難研究》（臺北：法界出版社，二〇〇六）。釋明復，〈「監督寺廟」之史的剖析〉，杜絜祥主編，《明復法師佛學文集（一）》（新竹：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二〇〇六），頁三十——四六。